

# 清代《春秋左傳》學的目標、發展 與各階段的主要課題

## The Objectives, Development, and Main Issues at Each Stage of Qing Dynasty *Chun Qiu Zuo Zhuan* Studies

羅軍鳳 (Luo Junfeng) \*

### 前言

梁啟超《清代學術概論》將清代學術分成節節復古的四個階段，他講清儒以復古為解放，但他沒有講清代學術何以愈趨愈古，筆者從考察清代《春秋左傳》學史的角度看，義理的追求才是清代學術節節發展的源動力。強調義理對清代《春秋左傳》學發展的影響，可能會招致一些人的不滿，他們會致疑：在現今再講義理，還有什麼實際意義？筆者頗為贊同美國學者艾爾曼 (Benjamin A. Elman) 所說：義理追求在清儒，再怎麼強調都不過分，經生奉經學為一生的事業，所作所為都與經學義理息息相關。<sup>1</sup> 經學而講義理，應被視為天經地義，這是還原歷史、以「清儒還之於清儒」的必要手段。經學義理，被現今的學術史研究者所忽視，然而它卻是左傳學發展的內在線索。

在過去的學術史中，清儒自始至終的義理追求被淡化，甚至被否定。比如說，乾嘉學者重訓詁考證，但都口口聲聲追求義理，這在很多人看來，是自欺欺人，所以不甚措意。殊不知我們用自己的判斷輕易否定了清儒的自說自話，使我們看不到清代學術發展的真正推動力。事實上，乾嘉漢學家以特殊的考證的方式實現著他們的義理追求，找到了一種與宋儒截然不同的達成義理的方式，不管它的客觀效果如何，不管後人如何評價，乾嘉漢學對於義理追求，不曾稍棄，此為真實的客觀存

在，不由人的毀譽、判斷而轉移。今人看到了考據與義理的不相諧，卻忽視了漢學家「求道於典章制度」之處的變通，以致於認為考據與義理截然兩分，清代學術據此兩端各自發展，這種認識，不合清代學術的實際。

考據與義理，分屬於學術的不同層面，考據繁盛在清代，是清代經史之學的主要治學方法，而義理，卻是自漢至清經學的一貫追求。考據只是乾嘉漢學言說義理的一種方式，而清儒義理的追求方式並非考據一門所能窮究。就經學義理的追求方式來講，今文經學不同於古文經學，清初學術不同於乾嘉漢學，晚清的古文經學也與乾嘉經古文經學有異。縱觀清代經學史，清儒不是不講義理，而是隨時在講義理，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呈現出不同的義理的言說方式，在否定加否定的進程中，極大限度地接近孔孟原始義理。清初經學復興，改變宋儒棄傳講經的說經方式，代之以傳注求經的說經方式；乾嘉漢學極盛，學者求道於「典章制度」，改變了宋儒空衍義理的局面；清代今文經學以義例治經，又改變了此前乾嘉學者義理追求終落不到實處的局面；在今文經學的影響之下，晚清經古文經學開始建立自己的義理體系。義理的追求使清代學術屢屢發生轉向，清代學術發生重要轉折的關口，義理都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，研究清代學術史，不能對清儒的義理置之不理。筆者認為，清代《春秋左傳》學的發展，可以描述為在義理追求的總體目標之下，不斷提出新的研究課題，為此不斷調整自

\* 作者為西安交通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副教授。

1 [美] 艾爾曼,〈再說考據學〉,《讀書》1997.2:72-80。

己的治經方法，不斷樹立自己的學術規範，而形成明晰的發展階段，各階段之間有機聯繫，循序漸進。

# 一

《左傳》經學關注的最終目標是聖人（孔子）的義理。《左傳》的義理體系包括義例（又稱凡例）、「君子曰」等。自有經學，就有義例，義例是經學義理的主體。義例的實質，就是系統化、邏輯化地講述經書的微言大義。《左傳》被視為經學之一部分而被認為有義例，自漢代始。《左傳》的「君子曰」因其附贅在敘事之後，直接表示對歷史人物的褒貶，也是《左傳》義理體系的組成部分之一。

《左傳》的義理問題貫穿從漢至清的左傳學史，《左傳》的義理是否傳達了孔子《春秋》的義理，是否真正體現了儒家的思想體系，一直以來受人質疑。<sup>2</sup> 漢代今古文之爭的焦點即《左傳》是否傳自孔子，其義理是否純正；唐人趙匡認為《左傳》的義理不得聖人（孔子）之旨，由此懷疑《左傳》的作者不是與孔子善惡相同的左丘明；宋代林繼中懷疑《左傳》的「君子曰」全為劉歆附益，<sup>3</sup> 自此，《左傳》的義理和劉歆有了不解之緣。清代理學家方苞有過之而無不及，他持程朱義理以為權衡，推測《尚書》、《周官》、《禮記》等多部古籍「不合」義理之處均為劉歆偽竄；乾嘉時期與戴震切磋學術的任大椿認為《周官》為劉歆偽造，語出驚人，令戴震婉言相勸，為學「不能徒以意衡量」；<sup>4</sup> 乾嘉時又有一學者姚鼐認為《左傳》一書多有吳起等人的辯飾與附益。<sup>5</sup> 可見在清代今文經學興起之前，《左傳》、《周官》、《周禮》等多部古籍被認為經後人附益、偽竄過，究其實，經學家眼中的所謂「附益」與「偽竄」，不過是認為經書中某些內容不合義理，於是這些內容便不屬於經典本身，而

必出於後人附益。《左傳》的附益者可以是劉歆，也可以是吳起等人，甚至有另一個左丘明，但絕不是孔子所稱道的左丘明；將《左傳》的附益者鎖定為劉歆，直到今文經學興起之後方成披靡之勢，而這中間的關鍵人物是劉逢祿。劉逢祿《左氏春秋考證》用清代古文經學所常見的注疏著述體例，條分縷析地考證，「釐定」《左傳》的義理全出於劉歆附益，認為《左傳》不傳《春秋》。劉逢祿全面否定《左傳》的義理，並直斥《左傳》的經傳身分，<sup>6</sup> 這實際是以一種極端的方式表示出對《左傳》義理的懷疑。劉逢祿的觀點迅速藉助今文經學的興起而侵佔了原本以《春秋左傳》學為主體的春秋學大局，晚清康有為不僅否定了《左傳》的義理，連《左傳》的真實性一併否定掉，致使晚清《春秋左傳》學局勢維艱，章太炎、劉師培等人苦苦支撐。可以說，《左傳》的義理問題由來已久，它引發了清代經學史上曠日持久的今古文之爭，《左傳》的義理是貫串清代《春秋左傳》學發展的重要線索。

《左傳》的義理問題之所以一直懸而未決，很大程度出於人們對於《左傳》義理的闡釋持不同觀點，不能定於一尊。《春秋》三傳中，義例之學最為顯著者為《公羊傳》，如時月日例，張三世、張三統之例，在漢代影響深遠。漢代賈逵、服虔等人，借鑒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的義例以治《左傳》，但今文學家不承認《左傳》是《春秋》之傳，自然不承認它有經學義理或義例。而賈逵、服虔等人雜采《公》、《穀》義例闡釋《春秋左傳》義理的方法，被晉代杜預譏為「膚引」。晉代杜預建立起有別於今文經學的義例體系，將《左傳》的義例分為凡例、變例，存在周公制典與當時典制的區別。對杜預此說，即便持「疏不破注」觀點的唐孔穎達《春秋左傳疏》也認為不當，他認為義例不當有新例、舊例之別。反對者都以杜預此說無據，只不過是沿襲了學派相爭的

2 恕筆者不能在此展開關於《左傳》一書之性質的討論。筆者認為，要回答《左傳》是否《春秋》之傳，應還原《左傳》成書時的歷史語境。參見羅軍鳳，〈左傳「經」「史」關係之辯證〉，《學術論壇》2008.2: 185-189 及〈左氏春秋的撰作與流傳——左傳的性質之考辨〉，《聊城大學學報》2008.4: 44-48 等文。

3 朱熹，《朱子語類》卷 83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6）。

4 戴震，《與任孝廉幼植書》，見戴震著，《戴震文集》卷 9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0），頁 138。

5 姚鼐，《左傳補注序》，見姚鼐著，《左傳補注》卷首，惜抱軒全集本，同治五年（1866）省心閣版。

6 參見羅軍鳳，〈劉逢祿《左氏春秋考證》的方法論〉，《長江學術》2009.4: 141-147。

陋習，編出周公制典的故事來，以便壓住《公羊》學說中孔子為後世立法的說法。更為重要的是，杜預的五十凡例，簡言之，就是概括了探討《春秋》義理的五十條「規律」，但此「規律」的推衍，不能以一推十，甚至一事一「凡例」，不足以提挈《春秋》的微言大義。義例之學雖然講的是空靈的義理，但其基本屬性是邏輯性、條理性，故以融通為貴，杜預的義例之學遠不能融通，所以《左傳》杜注在唐代以後即立於學官，但民間質疑與批評聲不斷。宋人釋經，欲跨越宋以前一切朝代之經學，直陳古聖先賢的微言大義，漢儒義例、杜注義例自然全被拋棄。

而清代學者竭力恢復漢學，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與宋儒相抗，並報宋儒棄漢儒之仇。清初學者大多因「空鑿」等原因否定了義例說經的方式，雖否定了義例，但並不否定義理的追求，否定的只是義例解經的治經方法，並沒有否定義理的最終追求。顧炎武、惠棟、戴震等人開創了一條考證式的義理追尋之路，主張「經學即理學」、「求道於典章制度」，而不空衍義理，影響了清代乾嘉漢學的主要治經方法。乾嘉時代東漢舊注的搜輯比比皆是，但唯獨沒有對漢儒義例的搜集。乾嘉諸儒復古的是東漢古文經學，義例被認為是漢代今文經學的治經方法，不被學者認可。

今文學者劉逢祿完全質疑乾嘉漢學以訓詁通達義理的可能性，否定了《左傳》以凡例、變例、「君子曰」等形式表現的義理，同時，劉逢祿找到了《公羊》義例之學來闡發《春秋》的微言大義，於是《公羊》經學的義例體系替代了《左傳》的義理體系大行其道。毋庸諱言，今文經學義例治經建立起一個頗為強大的邏輯體系，姑不論充實這個體系的內容，從結構來講，今文經學的義理體系遠比乾嘉漢學的義理體系完整、嚴密，這是乾嘉學者不能不正視的一個問題。在《左傳》的義理被今文經學徹底否定之際，建立一個與今文經學的義理體系相抗的經學體系便勢在必行。也就是在今文經學興起之後，《春秋左傳》學也開始研究前所置點的義例。

道、咸、同、光年間因治《左傳》而聞名朝野的劉

氏家族，生逢今文經學大行其道之際，在清理清代《左傳》經學所有注疏成果，著《春秋左傳舊義疏證》的同時，已擬對《左傳》的義例作類似的總結性的工作。劉文淇擬議《左傳》義例之學的宗旨是「以《左氏》之例還之《左氏》」，以此與杜預的釋經體系相對，但劉文淇畢生精力萃於《左氏長編》，著《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》僅一卷，《左傳》義例的研究並未開始。據《續碑傳集》記載，劉毓崧曾著《春秋左氏傳大義》，劉壽曾曾著《春秋五十凡列表》，<sup>7</sup> 雖著稿不知去向，但可知劉氏子孫的著作方向。劉師培在 1909 年以後，著《春秋左氏傳時月日古例考》、《春秋左氏傳古例詮微》、《春秋左氏傳例解略》、《春秋左氏傳傳注例略》、《春秋左氏傳例略》等著作，以漢儒義例治《左傳》義例，最終對家學中早已規劃但用力不多的《左傳》義例之學有了交代。與此同時，章太炎用杜預的義例說解《左傳》的微言大義。在晚清與清初提出《春秋》義例問題尚未解決的黃宗羲形成呼應，清代學者的《左傳》義例學終於從無到有，浮出水面。《左傳》的義例在清初不講，乾嘉時不講，在今文學興起之後，受今文學義例治經的影響，才開始講，章太炎和劉師培則分別建立起《左傳》的義例體系。

清代《左傳》經學對《左傳》的義理一直存在偏見，直到晚清劉師培、章太炎，才以歷史的研究法，以前經學中刺刺不休的義理問題做了個徹底的了結。考察清代左傳學術史，不能不發現一個基本事實：義理的追求貫串清代《左傳》學的始終，圍繞著義理的不同實現方式，清代《左傳》學呈現出各個階段不同特點，可以說，義理問題，就是清代《左傳》學的發展線索、核心問題，以及目標課題。

## 二

貫穿清代春秋學史的學術命脈就是《春秋》義理的追求，不變的是義理的追求，變化的是治經方法。筆者特別關注相同的義理追求之下不同的歷史階段治學方法的轉變，各個不同階段的主要治經方法略如下：

7 分別見於程琬，《劉先生家傳》、劉恭冕，《劉君恭甫家傳》。見繆荃孫編，《續碑傳集》卷 70、卷 75，《碑傳合集》（上海：上海書店，1988），頁 2886、2894。

### （一）反宋儒而起的廣輯傳注的治經方法

元明以來，宋學盛行，學者空談義理，游談無根。清初諸大儒爲了拯救被宋儒湮沒的孔孟原始義理，在科學興盛、經學荒廢的歷史背景之下，極力搜輯漢代以迄各種傳注，擇善而從，擇優化地拼湊聖賢義理。

### （二）乾嘉漢學的治經方法

乾嘉乾隆時期四庫館開之後，古學復興，經清初百餘年的實踐，學者在各種傳注中選擇了漢注作爲傳達聖人微言大義的範本，其理由是漢人傳注在年代上與聖賢接近，所以應得義理之真。乾嘉漢學的治經風氣中，《左傳》經學專宗東漢賈逵、服虔、鄭眾等人的語詞訓詁，用以補苴杜注（杜預《春秋經傳集解》），沒有過多涉及西漢諸儒與東漢賈逵、許慎、容穎等人的義例之學。乾嘉漢學提倡「訓詁明道」的治經方法，宣稱「理義非他，存於典章制度而已」，力圖通過禮樂典章制度等實學考證推求聖人的義理，忌宋儒空衍義理之「虛」。

### （三）由《公羊》經學的興起而帶來的義例治經方法

義例治經，即以條例系統闡述經學義理。清代公羊學及穀梁學以義例治經，否定《左傳》義理。清初以來的《春秋左傳》學因爲厭棄直言義理，所以廢棄了漢代《春秋左傳》學曾採用過的義例治經的方法。公羊學義例治經的體系相對《左傳》的義例體系嚴密而完整，一時吸引了許多追捧者，同時對《左傳》經學產生了極大的影響。在今文經學強勢興起之後，《左傳》經學自身也開始提倡義例治經，藉以闡發《春秋》義理。東漢《左傳》學者的義例之學，乃至西漢、先秦《左傳》學者的微言大義開始受到重視。

### （四）晚清乾嘉漢學治經方法的革新

晚清，俞樾、孫詒讓等古文經師採用訓詁的範圍擴展到先秦子書，不再單純假借東漢諸儒的訓詁、義理，而是將《春秋左傳》學推置於更接近先聖的歷史語境之中。章太炎、劉師培等人尤其推崇西漢劉向、劉歆父

子、司馬遷、賈誼等人對《左傳》的研究，闡明東漢舊注之前的西漢、先秦舊注對《左傳》訓詁、義理兩方面的重要意義，使得乾嘉漢學專宗東漢古注的治經方法得以改進，並煥發出新的生命力。

### （五）不同於《左傳》經學治經方法的評點學方法

《左傳》評點學伴隨清代《左傳》經學的始終，評點學承漢以來人們對《左傳》義理的質疑，不將《左傳》當作《春秋》之傳，徑以「文章」視之，著重分析篇章結構。方苞的古文義法理論產生於史傳評點中，與科學、時文有著不解的淵源。<sup>8</sup> 清代《左傳》評點在篇章結構的分析之外，加入了經世的內容、個性化的閱讀方式，這成爲清代《左傳》評點的亮色。

簡言之，在義理的追求過程中，學術由不分遠近地搜討進至專宗東漢，又由專宗東漢進至專宗西漢，最後又進至復興先秦諸子學，學術層層返古。清初《春秋左傳》學即摒棄宋人經說，並提出諸多實學課題，極力在文字與訓詁上接近經書原貌。雖則如此，聖人的微言大義仍不能滿足，所以有《公羊》經學用《公羊》敷講義理，直陳經義；乾嘉漢學亦自加改進以應時需，講求漢學訓詁的同時，闡發微言大義；最終有劉師培、章太炎別創《左傳》的義例體系。在清代一直存在與《左傳》經學追求微言大義平行的一股風潮，即用《左傳》章法講古文、時文之創作，我們稱此爲《左傳》的文學研究。

## 三

在追求義理的總體目標之下，清代《春秋左傳》學在不同的階段，應對相互關聯但截然不同的課題，樹立了各階段不同的學術規範。清代左傳學的發展軌跡實際上就是在義理追求的總的目標之下，舊課題的解決與新課題的樹立的過程，實際也是舊學風的革除，新學風的發展並延續的過程。我們可將清代《左傳》經學分爲如下三個階段：

第一階段，《左傳》經學復興階段。從清初（1644）

8 參見羅軍鳳，〈方苞的古文「義法」與科學世風〉，《文學遺產》2008.2: 124-136。

至乾隆二十三年（1758），共 114 年時間。清初宋學風氣表現在《春秋》學領域裡，就是棄傳講經，空衍義理，鑽研褒貶，穿鑿附會。清初學者務求經世之學，所取途徑並不相同，但在提倡實學、務絕空虛的學術取向上卻是一致的。清初諸多《春秋》及《左傳》的經解著作中，都表現出新的務實學風，即不空言立論，而求言之有據。清初魏禧《左傳經世鈔》、朱元英《左傳拾遺》等著作在《春秋》三傳中選擇《左傳》當作經世的指南，用以闡說君臣大義、人生哲理，以為當今世用；李塨《春秋傳注》將《春秋》當作孔子經世之書，以「禮」貫穿《春秋》史事，而非空衍義理，陸奎勳《春秋義存錄》集經緯子史中所有「孔子曰」以闡明《春秋》微言大義；汪紱《春秋集注》主於追求程朱熹所未言說的《春秋》義理，糾《胡傳》之失，而以《春秋》三傳為依。顧炎武《左傳杜解補正》、朱鶴齡《讀左日鈔》等著作為求古聖先賢的義理，開始關注漢唐古注及《左傳》杜注在溝通《春秋》微言大義的過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。萬斯大《讀春秋隨筆》和全祖望《經史問答》為探討《春秋》本義，從探討《春秋》事實出發，集矢於《左傳》義理，以批判的方式強調了《左傳》在經解中不可或缺的作用。清初《左傳》經學更多的著作是廣采漢唐以迄宋元各朝經說，最後斷以己意，在經解和原著之間，加入了前人傳注這一橋樑，清人的義理解說由此具備了超越宋人的客觀性。清初廣輯傳注從俞汝言《春秋平義》（康熙十五年，1676）糾集三傳以正胡傳開始，此後朱鶴齡《春秋傳注集說》（康熙二十年前）、《讀左日鈔》（康熙二十年，1681）將傳注擴展到宋元，又上推至漢唐，到康熙三十八年（1699）「欽定」《春秋傳說匯纂》引用前代注家計 134 家之多，為《春秋》集傳之最。直至乾隆十三年（1748）顧棟高《春秋大事表》，仍廣輯傳注以求孔聖微言大義。

清初保留宋儒說經習氣的是孫嘉淦《春秋義》、方苞《春秋直解》、牛運震《空山堂春秋傳》等著作，在清初已無大的影響。孫嘉淦棄傳講經，後自覺其失，旋毀其板。方苞以古文名家，後受萬斯同的影響，轉攻經史；方氏在《春秋直解》中大言褒貶，仍襲宋儒棄傳講經之風，抹煞史事在經說中的作用，於是在傳注淆亂、經文相詆中自尋孔子筆削之旨，一切以義理為權衡，其經學造詣不被學者認可；牛運震不信三傳，動相駁難，

翻新立異，顯然是宋代學術的遺留，終不被人看重。

上所提清初反宋學風氣中的諸《春秋》類著作，無不棄用胡傳，廣輯傳注以求經解，並著意推出《左傳》，作為獲解《春秋》經義的依據，同時兼采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，這樣，《春秋》最早的三種傳注取代了宋人傳注，成為經義闡說的根本。雖自唐代始，《左傳》杜注便立在學官，然而相較其他經學科目，《左傳》並未受到重視。唐代科舉考試分大經、小經，《左傳》因其部帙繁重，研習之人不多；北宋王安石改革科舉考試，曾經一度廢棄《春秋》一門，其他科目也只用王安石新義，元明以來，科舉考試中《春秋》一經只用南宋胡安國《春秋傳》。也是從唐代開始，啖助、趙匡等人懷疑《左傳》不得孔子真傳，《左傳》的義理受到質疑；唐代中後期，學者即「獨抱遺經」，《春秋》三傳被束之高閣，到了宋代，疑經之風愈演愈烈，《左傳》不僅義理可疑，甚至失去了《春秋》之傳的身分，學者紛紛棄傳講經，空衍義理。從宋至明，不乏《春秋》學著作，但研究《左傳》的經學著作寥寥無幾。清初學者反束書不觀、棄傳講經的宋學風氣，提倡經世致用，廣輯一切傳注以解經，《左傳》方被樹立為獲解《春秋》經義的最重要的依據。清初左傳學的大功績是頗為隆重地將《左傳》重納入《春秋》的經解系統。

第二階段，《左傳》經學全盛階段，在乾嘉漢學的傳統治經風氣之下，《左傳》經學研究步入鼎盛。從乾隆二十三年（1723）至（1882），分別以惠棟的卒年和劉壽曾的卒年為起訖。惠棟的《左傳補注》產生於我們所界定的清初，但惠棟在當時絕少影響，他的影響在其卒後。惠棟《九經古義·左傳補注》率先使用古注，糾正杜注之失，其作遠在古注輯存大規模出現之前，預告著乾嘉漢學治經風氣之下《左傳》經學全盛期的開始。儀徵劉文淇、劉毓崧、劉壽曾祖孫三代治《春秋左傳》所得《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》，不僅輯采古注，而且採用清代乾嘉學者的成果，是輯采古注以注經的代表作，雖未完帙，但是集乾嘉漢學之大成。

乾嘉漢學標榜的「古學」以對漢代「古注」的搜輯、整理、運用為主的，此即乾嘉漢學的傳統治學門徑。依據人們對「古注」的理解、運用的程度，乾嘉漢學治學風氣之下的《左傳》經學研究經歷了兩個小的階段，其一是古注的搜輯和整理階段，其二是古注的運用

階段。嚴蔚《春秋內傳古注輯存》、余蕭客《古經解鈎沈》、任大椿《小學鈎沈》、梁履繩《左通補釋》等輯古之作於乾隆朝出現；入嘉慶朝以來，搜集舊注，旨在比勘杜注之失的著作風起雲湧，洪亮吉《春秋左傳詁》、張聰咸《左傳杜注辯證》、邵瑛《劉炫規杜持平》、焦循《春秋左傳補疏》、李貽德《賈逵服虔義輯述》、馬宗樞《春秋左傳補注》、臧壽恭《春秋左氏古義》、沈欽韓《春秋左傳補注》、丁晏《左傳杜解集正》等著作將《左傳》杜注所不完備的語詞音訓、地理訓詁、典章制度的考證等帶到一個漸趨精密、完整的地步。學者從依賴古注過渡到辨析古注，擇是而從，對於古注，逐漸擺脫了對它的迷信、盲從，乾嘉漢學的重要著作即誕生於此時。此一時期王念孫、王引之父子的《讀書雜誌》、《經義述聞》入於漢學之門戶，又不囿於漢學之藩籬，不僅引用東漢古注，同時大量徵引西漢經典、先秦子集，以考證經史疑難，這為晚清乾嘉漢學的發展指明了方向。

乾嘉時期古學的興盛離不開一個關鍵人物——戴震。乾隆二十二年，戴震與惠棟相交，就古訓治經的方法達成共識，乾隆三十九年（1739）戴震借入四庫館修書的便利，標榜惠棟與自己推闡的古訓治經的方法，一時古學風行朝野，至乾嘉之交（1790-1800），到達鼎盛。在《左傳》經學的全盛期，一大批著作採用乾嘉漢學的傳統治經方法，清代《左傳》學的重要著作相繼出現，此一階段，莊存與、劉逢祿的今文經學雖起，但《左傳》經學專宗漢注的傳統並未中斷。

第三階段，革新乾嘉漢學傳統，並受今文經學影響的《左傳》經學研究的新階段。從嘉慶初年劉逢祿今文經學開始流行（1800 年左右），直至清末（1911）。《左傳》經學為應對今文經學，超越乾嘉漢學的傳統治經方法，吸收今文學義例治經的治經方法；不僅採用東漢的訓詁，而且採用西漢，乃至先秦兩漢的訓詁。如果說乾嘉漢學全盛之時，惠棟、戴震對學界的影響至巨的話，此一階段，影響學界最著的當推王氏父子。俞樾步趨王氏父子，仿《經義述聞》成《群經平議》，仿《讀書雜誌》著《諸子平議》，孫詒讓著《札迻》，其序高度評價王氏父子的群引旁籍，聲訓治經的方法。其他如於鬯的《香草校書》等著作無不走出了東漢古注的藩籬，顯現出王氏父子的治經方法在晚清的承繼與發展。晚清乾嘉漢學的殿軍——章太炎、劉師培二人的《春秋左傳讀》、

《司馬遷述左傳義例序》等代表性著作將東漢以前的古注放置在一個相當重要的地位，尤其是劉師培系統地闡述了《史記》這部被傳統乾嘉漢學所淡漠的西漢史籍對於《左傳》經學的重要意義。

乾嘉時代古學大興之時，先秦子籍、西漢經史時或治經之助，但處於從屬地位，未被當作治經的中心。惠棟在首倡漢儒舊注治經的時候，也用先秦子籍證經，但是對先秦子籍的認識停留在「粗鄙」、「芻夫之議」之上，對西漢史籍——《史記》的徵引也非常有限，而在乾嘉漢學之後，《史記》對於治經的意義方始被學者發現，並被大力推行；先秦子籍也不再成為治經的禁區。乾嘉時期學者汪中治《墨子》，尚被道學家誣為名教之罪人，王念孫父子校定先秦兩漢經子書籍二十三種，成《讀書雜誌》，止於訂正文字音韻之訛，乾嘉之後的學者所治子籍的範圍繼續擴大，不僅治文字音韻，而且治微言大義。俞樾《諸子平議》治諸子書凡十五種，而散見於《曲園雜纂》、《俞樓雜纂》的又不下四十種，而孫詒讓的《札迻》，治諸子書達七十七種之多，很多是久不為人所治的書籍。諸子學的興起，促使晚清學者研究不僅研究其訓詁，而且研究它的內容，章太炎等人就引用《吳子》《賈子》等書闡發《左傳》的古義。

章太炎、劉師培二人都認同了義例治經對經學的意義，劉師培突破家學的限制，以東漢義例之學建構古文經學的釋經體系，章太炎擁護為乾嘉漢學一再廢黜的杜預義例及釋經體系，並用先秦諸子傳達《春秋》的微言大義。乾嘉漢學全盛之時學者尚未闡發的微言大義，被晚清古文經學家重視並予以系統闡發。

這三個發展階段大體在清代學術大的背景之下，關注清代《春秋左傳》學自身發展的軌跡，雖然顧及今文經學的興起並發展，但側重於今文經學對《左傳》經學的影響。今文經學對乾嘉之後以《左傳》為核心的古文經學的影響因人而異。嘉道以後的學者若同樣治《左傳》，有些恪守傳統，有些有所革新。那麼，恪守傳統的，在清代左傳學發展史上，歸屬於第二個發展階段，而變革改易的，則屬第三個發展階段了。所以我們不難看出《春秋左傳》學的第二階段與第三階段有交合之處，也不難理解清代最能代表乾嘉漢學治經成果的著作——《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》產生於嘉道以後，彼時，公羊經學已經興起，且形成蔓延之勢，但此著作仍自

覺地遵守乾嘉以迄的治經方法，與《公羊》經學保持著疏離關係，所以我們仍視其為乾嘉漢學全盛期的著作。與嘉道之際儀征劉氏父子治左傳同時的俞樾、陳澧、孫詒讓等古文經師，其治經方法則已受《公羊》經學的影響，或者說受《公羊》經學的激勵，而對乾嘉漢學的治經方法有所改進。依據今文經學並沒有阻斷乾嘉漢學治學方法的事實，依據清代乾嘉之後乾嘉漢學與今文經學共同存在、並相互影響的事實，我們沒有在「乾嘉漢學的治經方法」與「受今文經學影響的治學方法」之間，樹立一道明確的時間分界線，如果一定要按今古文學的分野將左傳學的發展作時間上的硬性區分，必會傷及學術史本身，故不為我們所取。但實際上，《春秋左傳》學「受今文經學影響」的發展階段對於「乾嘉漢學傳統治經風氣」之下的《左傳》經學研究來說，仍是一個進步，仍然構成發展的階梯。

#### 四

以上三個階段的劃分從治經方法的角度來講各階段各自不同的特色，換個角度，從學風的發展與繼承來看，這三個階段實際上一脈相承。《春秋左傳》學首先要革除清初瀰漫於科舉與講學之中的宋學風氣；接著要樹立清代《春秋左傳》學自身的學術規範，即乾嘉漢學的治經方法，在此，又與魏晉學風形成衝突；最後是晚清，在《公羊》經學大肆流行的時候，《春秋左傳》學要仍保持與發展自己的治經傳統。在這三個階段中，有所反對，便有所樹立，欲有樹立，無不通過反對。不可否認的是，學風所一致反對的事物成就了各階段的主要課題，現將各階段的主要課題列舉如下：

第一階段，棄《春秋》胡傳，樹《春秋左傳》。《春秋》胡傳作為官方經義的範本，在清初隨著科舉考試的推行而大行朝野，與之相應的是濃厚的宋學空氣。而清代經學反宋學，排擊科舉，顯示出截然不同的治學趨向。宋學棄傳講經，空闡義理，清初學者於是搜輯經傳，不空衍義理；科舉只尊《春秋》胡傳，所以學者棄胡傳於不顧，胡傳因其附會穿鑿，被認為不得聖人本意而被摒棄。清初「春秋」類經學著作輯采各種傳注，胡

傳最多輯采十之一二，甚至不被採用。在輯采的各類傳注中，《左傳》因其時代靠前，也因其重要性，常被列為第一位，同時，漢注因其靠近先秦，被認為最得聖人真意，取得了優越於其他傳注的地位。這一時期的左傳經學著作，如顧炎武《春秋左傳補注》，都用史實理解《春秋》筆法，經義因此平易暢達，與宋學講經棄《左傳》空衍義理、穿鑿刻深有異。

第二階段，批《左傳》杜注，樹《左傳》新疏。第一階段從眾多傳注中擇取《左傳》，此一階段開始關注《左傳》自身；第一階段輯采各家傳注，此一階段專注於東漢舊注，而排斥其他，舉凡《左傳》的訓詁、典章制度之學都成為學者的研究對象，漢注而不是杜注成為研究《左傳》的典章制度之學不可缺少的拐杖。隨著此一階段「古學」大興，古注輯佚之風大盛，古注從事無巨細的輯佚到精挑細選的運用，都是直接針對杜注，杜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與批判。

縱觀清代乾嘉漢學興起、興盛的整個過程，學者不斷補苴杜注，與此同時，杜注遭受了空前絕後的排擊。<sup>9</sup>作為最早的保存最完整的《左傳》注本，杜注受人關注本無可厚非，學者研習《左傳》，雖然在事實上不能缺少杜注，但杜注不因為它是最古的傳注而珍貴，反而因為它是魏晉經注而不受尊崇，且因它擇采漢儒及同時人的經說而隱沒其名，不合清人的治學規範，而受人鄙棄；又因為它改寫了《左傳》古文經文，改變了原文《春秋》和傳注分別刊行的模式，而被喜好復古的學者們深恨；更為重要的是，杜注曲為「回護」《左傳》，寧言周、孔誤，不言《左傳》非。對杜注的排擠、攻擊，顯現了清儒不同於杜注（魏晉）的治學方法、特點與治學風氣。清儒一直致力於新疏的著作，以期取代杜注。清代最負盛名的《左傳》新疏——《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》在訓詁、典章上重漢儒，每引必稱名，每論必有據；對《左傳》議論之失勇於糾正；不師守專門，古今兼采，實事求是，全面體現了乾嘉漢學的治學規範，與杜注所代表的學風迥異。

第三階段，斥《公羊》經學，維護《左傳》。今文學者劉逢祿論《左傳》的書法、凡例、「君子曰」等有關微言大義的內容都是劉歆偽造，認為《左傳》是史

9 參見羅軍鳳，〈乾嘉漢學視野中的杜注〉，《漢學研究》27.3（2009.9）：251-282。

書，不是《春秋》之傳。今文學者皮錫瑞、崔適等人一般從義理、著述體制、流傳授受等方面否定《左傳》的經解身分，但仍承認《左傳》是一部史書，其典章制度可信。至康有為，完全否定《左傳》的真實存在，認為《左傳》連同《周官》等書都是劉歆一手偽造。今文學者加於《左傳》及古代典籍身上的誣辭，使古文經學家不得不辨。晚清學者劉師培、章太炎通過揭示《左傳》在先秦及西漢的流傳狀況，章、劉雄辯地說明《左傳》在先秦、西漢的真實存在。晚清的古文經學家為《春秋左傳》學的研究開拓了新的研究領域，乾嘉以迄學者的訓詁考證方法直到現在，仍有它的現實意義。

以上所言清代《春秋左傳》學的三個階段及主要課題都屬於經學研究範疇。從理論上說，《左傳》經學研究之外，還有《左傳》史學研究、《左傳》文學研究，而從實踐上看，清代《春秋左傳》學的研究集中於經學領域，其中心議題是《左傳》是否《春秋》之傳。在第一階段，回答曰「是」，《左傳》是《春秋》之傳，相較其他傳注有絕對的優勢；第二階段則進一步闡發《左傳》如何傳經，提出了乾嘉漢學「訓詁明道」的治經方法論；在第三階段，《左傳》的經傳身分被今文經學否定，《左傳》經學則從事於建立自身的釋經系統。以上三個階段都圍繞著《左傳》的義理問題，而純粹意義上的《左傳》史學研究是不存在的。乾嘉漢學統一於治經方法之下，無治經治史的區別，《左傳》是作為一部經書而非作為一部史書進入學者的研究視野的。

至於《左傳》的文學研究，以《左傳》的評點學為主體。《左傳》評點學在成就上不能與《左傳》經學相提並論，卻與《左傳》經學研究長期並行。評點學否認《左傳》是《春秋》之傳，與《左傳》經學研究適成反

對，卻與科學、時文聯繫密切。方苞等人從《左傳》等史傳文學中抽繹出來的古文「義法」成為乾隆朝「衡文取士」的重要標準，影響深遠。<sup>10</sup>

## 結語

經生對《春秋》的義例、義理的追求，使清代左傳學獲得不斷節節前進的源動力，應該說，它有功於清代《左傳》學，其功厥大。但事情往往是成也蕭何，敗也蕭何，清代《左傳》學受益於義理學，但影響限制清代《左傳》學發展的也正是義理。義理的無處不在，即便是聲名卓著的考證學者也不可避免地受主觀成見的影響，其顯例為段玉裁憑義理在三傳異文中作定奪，捨棄文本的依據，而一以主觀義理為歸，更遑論今文學者「決斷於六經」，以義理為權衡，輕易斷定《左傳》的偽竄，呈現出宋學主觀武斷的作風。<sup>11</sup> 義理使清代《左傳》研究擺脫不了傳統的經學研究的模式，不能徹底地推行乾嘉考證中科學的、史學的研究方法與精神，而且因為糾纏於經學義理，清代《左傳》學往往提不出更高更深的問題。欲使研究的成果更豐碩，義理的追求必隨著經學的淡出而淡出研究者的視野。經學的義理，筆者將其設定為構建清儒真實歷史世界的需要，把它作為學術發展的線索，而不在理論層面上著意闡釋它。義例是一種系統闡述經學體系的方法，對於經學來說，它至關重要，但對於跳出門戶之見的學術史研究來說，則僅止於客觀的描述，而無信仰與派別之分。利用清人研究成果，以作為現今《左傳》研究的基礎，必須拋開經學家的門戶之見，「就於史學立場，而為經學顯真是」。<sup>12</sup>

10 參見羅軍鳳，〈方苞的古文「義法」與科學世風〉，《文學遺產》2008.2: 124-136。

11 參見羅軍鳳，〈論段玉裁的「義理校勘」——為段、顧之爭進一解〉，《西安交通大學學報（社科版）》2008.3: 93-96。

12 錢穆，《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》自序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1），頁6。